

## 玉的叙事

## 夏代神话历史的人类学解读

□叶舒宪

物的叙事：  
研究夏文化的  
核心对象

现代中国学人对夏商周三代的探索经历了两大阶段，即疑古阶段和释古阶段。前者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均系后人叠加伪造，属于神话传说而非历史；后者认为三代历史基本可信，但需要重新求证。目前看来，较妥当的途径是结合考古学与上古文献的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商周两代的研究已进入新阶段，而对无文字的夏代的研究还是最大难点，进展缓慢。

中国的学问传统围绕传世文献而形成，离开了文字记载，学人们就难免望洋兴叹，如孔子所云“文献不足征”。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经验表明，借助于物质文化就可以对毫无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展开研究，乃至重新构造失落的文化。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提出“物的叙事”命题，给夏代历史探索带来重要启示：如何在没有书写材料的前提下，切实进入对夏文化的认识呢？

答案是在没有文字历史编年的情况下，要完全像研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那样，做出编年式的系统认识是不现实的。补救性的措施是调整研究对象，即将夏代历史视为夏代的神话历史，然后根据在夏代纪年范围内出土的物质文化材料，锁定重要的神话信仰和崇拜观念符号，再结合夏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夏代之后的商周时代的同类器物的线索，上引下联，重构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认知谱系。

将夏代历史换成夏代神话历史，是不是避实就虚和偷梁换柱呢？非也。后现代史学大变革的标志就是放弃“历史

科学”的旧理念，转向“神话历史”的新认识。岂止是夏代，就连清史和团的历史，不也被揭示出浓重的神话历史色彩吗？历史必从神话启程，而且一定要伴随着神话思维前行，这一认识是重新进入中国历史的门径。

怀玉者谁？  
直观 5000 年前的  
“圣人”

在华夏传统中，文献出现以前有没有神话呢？西学东渐以来引入“神话”概念的文学家们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们除了向《山海经》、《楚辞》等古书去寻找神话以外，并不看重文字记载之外的材料。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新传统却给出十分肯定的答案：从史前的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中照样可以解读出大量的神话。美国考古学家金芭塔斯的《活的女神》(1999)和英国神话学家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2005)，都已经作出研究示范，即如何将神话视野充分拓展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如果要找出奠定中国神话独有特色的第一关键，就是“玉”这种物质。

先秦思想的基石为儒道两家。两家的区别尽人皆知，但两家的一致处和共同渊源却探讨极少。其原因是：书缺有间，罕有西周以前的文字材料。儒家讲“学习”的名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直接来自史前东亚人加工玉的实践。儒家将君子理想比德于玉，和道家一起共同继承玉神话理念。《山海经》叙述149处产玉之山，原因何在？《穆天子传》叙述周天子不远万里到西方昆仑去寻觅美玉，又原因何在？

追踪玉神话和圣人神话之源，可在文本之外，找到更

深远的物质原型。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名言“圣人被褐怀玉”（《道德经》），明确点出圣人与圣物的符号对应，让人有可能找出儒道两家共同的神话渊源——“圣”的世界。

孔子对神与圣二词的不同态度，可知儒家神话立场。“圣”是人类中的杰出者，或称圣人、圣王。《论语·述而》提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是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却仰慕“圣”；其弟子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从而完成中国文化中最具有原型意蕴的造神运动。包括夏代君王在内的尧舜禹汤文武，是儒家理想的圣王神话历史谱系。史学家想将他们看成历史人物，却说不具其具体的在位年代与地点。我们将他们视为神话历史人物，因为其共同的一点就是都和玉神话密切相关。

从出土物证看：在尧舜禹之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的“唯玉为葬”和王者风采，充分证明古书所言玉器之神圣性，并非虚言。通过民族志材料的第三重证据（口传文化与民俗礼仪等），可复原圣人的本相——沟通神和天人的神圣中介。再通过第四重证据（即考古发现的圣物谱系）的法规和礼器，寻找中国圣人神话的史前原型，落实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玉礼器为符号的领袖。从直观的视觉表象和听觉感知，体悟圣人崇拜的6000年传统，梳理出从史前到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神话传承历程。

春风早度玉门关：  
玉神话大传统  
VS 儒道小传统

河西走廊乃丝绸之路的要塞所在。但是，该走廊上为什么没有“丝门”却有“玉门”

呢？答案很简单：早在文献记述的丝路之前两千年，这条险路就早已开通！不过不是为出口丝绸，而是为进口和田玉。《尸子》云：“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反。”在先秦典籍中讲到曾经抵达昆仑神山的人实在凤毛麟角，如《山海经》说的“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显然非凡夫俗子所能企及。中国神话第一大英雄羿去昆仑何求？不死仙药也。若进一步追问：西王母所独自主掌的人间唯一的不死药是由什么物质成分构成的？最可信的解答无非是一种中国人崇拜了七八千年的物质——玉。

新出土玉器证实：玉之路先于丝绸之路2000年就已开通。昆仑山美玉输送中原的历史有4000—5000年（故宫博物院的玉器专家杨伯达则认为有6000年）。

夏代史重构：  
禹成于玉，桀败于玉

有了考古学复原出来的玉文化的历史线索，考察夏代史的新思路便可以明确：夏代以前的玉器时代已经有了近4000年之久；夏代以后的商周时代玉礼器传统仍在延续发展，玉雕工艺则在战国、西汉时代登峰造极。据此可知：夏代必然是一个玉神话依然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时代。确认夏文化的范围和都城，都必须参考玉礼器体系从史前进入文明这一过渡时期的指标。具体而言，考察“琮璧圭璋璜琥”六器体系演化形成的轨迹，即可揭示夏代国家礼制的真相。

从文献看，可以说夏代君王成于玉，也败于玉。玉的储备与需求，对夏代统治者极为重要。《书·禹贡》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史记·夏本

纪》：“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可见大禹王天下靠的就是所谓玄圭——一件神秘的玉礼器！

《墨子·非攻下》云：“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瑞为天赐玉信。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掌握瑞玉圣物就足以号令天下。《容成氏》云：“桀不述其先王之道……以伐岷山氏，取其两女琬、琰，北去其邦，为桐宫，筑为瑱室，饰为瑶台，立为玉门。”夏桀亡国的原因似乎是对玉的崇拜进入迷狂状态的结果；他要四处征伐以求取大量的玉材，要将其宫室营造成模拟昆仑圣山的人间美玉山界。这完全可以看成由玉神话谱写的亡国史。

综上所述，根据物的叙事，可以重新进入历史，其基本认识原则是：

以往的神话研究大都属于纯文学研究，所看到的只是文学文本。未来的神话研究将拓展到文字以外的新材料，称为物质文化或物的叙事，即“第四重证据”。由此进入的是“文化文本”（culture as text）。

文学与文化文本的关系是母与子的关系。神话历史的整合研究意义在于，在文字小传统背后探索非文字的大传统。其方法的结论可借用傅斯年的说法，“史学即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有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只靠文献材料的研究，无法“出”文字产生前的“货”，所以要将文献材料相对化，用一组公式来表达即为：

文献 = 书写的小传统 = 能指  
四重证据 = 文献背后大传统 = 所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熊龙



■二里头 84M11 墓出土铜嵌绿松石熊铜牌

## 人类学的域外性

□徐新建

2009年1月起，笔者到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访学一学期。其间，参加了一次人类学系系列讲座，讲题是土地法：作为统治关键的原住民土地权——以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为例（The laws of the Land: Indigenous land rights as a key to government in East Kalimantan, Indonesia），其包含的八次讲演多以不同区域的个案为例，空间范围涉及很广，从莫桑比克到亚马逊流域，再从马其顿、黎巴嫩、巴勒斯坦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跨越了地球上的几大洲。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学在起点和核心上是西方的一门世界性学问，其全球性和域外性特征至今保存。在达尔文那里，其表现为人类与自然；而自泰勒、马林诺夫斯基、布朗以来，则



是欧洲与世界、西方与非西方以及白人与原住民。相比之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有人类学么？

这是值得追问和细想的。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此有两个提法：一是“人类学本土化”，一是“本土人类学”。如果说前者还带有某种批判、改造和超越意味的话，后者则是暧昧的。什么是本土人类学？难道只是先把西方范式照搬进来，然后再让学术和社会都自我人类学化？由此反观作为马林诺夫斯基学生的费孝通，其当年被“马老师”盛赞的所谓人类学转折，即从研究的域外性到本土性，到底对中国的人类学建设起到什么样的根本影响，或许还需重新反省。其中一个明显的后果是，自那以来，中国的人类学——如果有的话，似乎便走上了一条只看中国、不顾世界的狭窄之路。其结果之一，便是有人类学之名的研究大多演变为关在国门内的汉人社会学和少数民族学。

如今也有人开始对此检讨，并把原因归结为国力不足。果真如此么？现在国力强了，为什么仍然看不到中国人类学有“域外转向”的明显迹象呢？

我想问题关涉到人类学源头及其相关理念的差异，那就是说，在共同拥有“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后面，其实深藏着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在诸国林立的人类社会里，如果说人类学称得上“帝国学问”的话，从英国出发的人类学与如今的中国人类学显然不一样。原因之一也在于二者后面的帝国其实不同，一个更具世界性，一个只有区域性。

中国的传统“天下”破碎之后，至今未能完整地建立重新看待域外与自我的世界体系，从而影响了包括人类学在内诸多学科对全球认知的空间基础。若想改变，尚待时日，而且尚待新人、新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院)

## George D. Spindler 之文化教育人类学观

□袁同凯

Spindler 于 20 世纪 20 年代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最早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学校教育问题的学者之一，也是人类学界公认的在学科体系上促进教育人类学形成与发展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大部分教育研究建立在“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把教育视为某个群体中社会化的一种过程，即为在该群体中生存而获得必需的文化与社会知识的过程。因此，教育不一定具有政治性，而是每一个社会内部为使其成员获取生存知识的一种机制。

Spindler 不仅仅关注教育本身，更注重教育与其所属的社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学校代表主流社会，以文化机构的身份在社会上运作。如果学校是想建立社区而不是摧毁社区，那么，它就必须把移民文化纳入教学内容之中，而且这种纳入必须是全貌的，因为文化是一个有机体，包括语言、内容、风俗以及使文化成为完整无缺的隐形的意义之网。他在研究移民教育问题时发现，移民学童普遍具有心理上的断裂感。他认为人有两种自我，即持续的自我和情境的自我。持续的自我是个人过去的经验、意义以及社会认同连贯的自我，情境的自我是可以不同的情境中适应的自我。要发展为完整的人，儿童需要使他们的深层问题、他们的持续自我和他们在现代社会所扮演的情境自

我相协调。生活于传统社会里的儿童，一般而言他们的持续自我和情境自我是统一的、协调的，因而不会有断裂感。但当移民及其他弱势群体儿童置身于与他们的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便会失去本身传统社会的连贯性，而面临着断裂的感觉。这些遭到断裂经历的儿童经常被强迫在两个文化中选择一个，要么牺牲自身文化认同而获得在主流社会的成功，要么维持自身问题而在主流社会中失败。

针对不同族群的教养方式，Spindler 认为，在外来文化干预出现之前，每个文化本身的教育功能是维持传统文化系统。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成员必须对自己的文化系统有信心，其社会才能发展。对于弱势群体的儿童来说，主流社会所开办的学校并不是他们所熟悉的环境，教育的意义对于学童及他们的家长都是空洞的，有些家长认为主流学校的教育无用，有些家长则希望学童接受主流学校教育，以便改善其经济环境。不过学童在一个脱离了原来传统文化情境的环境中学习，失去了了解他们祖先成就的机会，加上学校提倡的希望不切实际，从而造成了弱势群体儿童学业的失败。

Spindler 注意到，当学校的价值取向在文化上有悖于非主流群体的价值，而且与非主流群体年轻人未来的工作机遇不相干时，许多人便不再把教育当做一种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而可能会发展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非主流的、实际上是反



主流的）价值取向作为向上流动的途径。正如 Spindler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学校的目标不是去同化哪个群体，而是鼓励各个不同群体去参与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过程。为社会培养人才是学校的基本任务，少数民族群体以及那些在经济机遇结构中受歧视的弱势群体，大都

非常关注他们下一代的学校教育。实际上，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移民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学校教育往往是这些弱势群体实现梦想的主要途径。

Spindler 认为，主流学校的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背景（阶级的或民族的）对弱势群体儿童的影响。他发现，有些教师根本意

George D. Spindler 把教育视为某个群体中社会化的一种过程，即为在该群体中生存而获得必需的文化与社会知识的过程。因此，教育不一定具有政治性，而是每一个社会内部为使其成员获取生存知识的一种机制。

识不到他们的文化偏见直接影响到他们与弱势群体儿童在课堂上的互动方式。Spindler 和其他研究者注意到，许多来自主流群体的教师在教学中偏爱那些与他们文化背景类似的孩子，而忽视那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更需要关怀的孩子。其结果是，那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往往成为学校教育的牺牲品。为了克服因文化

非连续性或文化冲突引起的学业失败，Spindler 建议对那些有潜质的弱势群体儿童实施“文化理疗”（cultural therapy）。用 Freire 的话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文化理疗就是唤醒被压迫者的意识。但 Spindler 则主张唤醒主流群体的意识，使强大的主流群体意识到他们在与某些非主流的弱势儿童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由文化或无意识因素决定的否定态度。他认为，能意识到这些从文化上或无意识中体现出来的行为与态度可能会引起那些受折磨儿童的极大反感，对于改善弱势群体学校教育的现状具有重大意义。

Spindler 对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以主流文化为重点的学校，需要注重结合非主流群体的传统文化，把他们的传统文化价值纳入现代主流教育体系之中，才能避免产生跨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才能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实现事实上的教育平等。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该尊重少数民族或弱势族群的文化传统，并从避免主流文化霸权的滋生和蔓延。当然，在分析 Spindler 的研究架构时，我们不难看出，尽管他不完全否认政治权力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作用，但他却有意无意地避开政治与权力关系来谈教育问题。其实，当代教育人类学家如 Freire、Apple 等人的研究已经表明，政治与权力关系是阻遏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儿童学业失败的关键性因素。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